

元代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

蕭 啟 慶*

摘 要

元朝的科舉制度是當時特殊政治社會結構的反映。蒙古、色目人在科舉中與漢族享有相等的配額，則可說是元朝科舉制度的一大特色。

蒙古、色目人為征服族群，與漢族地位不同，其固有文化與漢族亦大有差異。本文係根據《元統元年進士錄》及筆者重構之其他十五科進士錄，自三方面探討蒙古、色目進士的背景及其與登科的關係。

自家族仕宦經歷言之，多達八成的蒙古、色目進士出身於官宦家族，而來自布衣之家者不過二成。可見科舉制度的主要作用在於為官宦子弟增加一條入仕的途徑，但亦為原來甚為閉鎖的蒙古、色目統治菁英階層注入數量不大，卻甚重要的新血。

自族群分布言之，蒙古各族原有文化水平頗為近似，科舉所產進士的數目亦甚平均。而色目各族所產生進士人數的多寡則與其本族原有文化水平的高低具有密切的關聯。

自婚姻關係言之，甚多蒙古、色目進士的家族早已與漢族建立密切的通婚關係，嫁入蒙古、色目家庭的婦女不少來自漢族士人之家。這些漢族婦女往往知書識禮，對其子孫的文化取向及登科應舉的動向具有重要影響。

總之，從社會觀點來說，大多數進士是蒙古、色目族群中傳統菁英家族的延伸。從文化觀點來說，蒙古、色目進士則是其族群中漢化最深的一群。

關鍵詞：元朝、科舉、進士、蒙古、色目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一、引言

科舉取士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學者皆耳熟能詳。但是，科舉制度所造成社會流動的大小仍有爭論的餘地。較早的學者多認為：科舉制度為布衣之士進入官場的有效管道，也促成了近世以來政府的開放。¹近年來不少研究者則否定科舉在社會流動方面的重要性。²他們認為科第之士大多來自早具財勢的「地方菁英」(local elite) 家族，士大夫家族在區域社會中的經濟基礎及社會網絡才是其根本所在，科舉不過是這些家族延伸身分的工具，所起注入新血的作用不大。事實上，這兩種說法並非完全相互牴牾，而是相互彌補，科第之士雖然多數出身望族富室，但來自庶族小姓者也不乏其人。而富室望族亦惟有通過科舉方能成為「全國菁英」(national elite) 之一部分，並因而進一步鞏固其在地方之勢力。

過去研究科舉與菁英流動的論著偏重唐宋與明清等朝，探討元代科舉的論著雖然已有不少，但大多數著重科舉的行廢及制度的本身，³有關科舉與菁英流動關係的研究仍不多見，可說是一個「失落的聯鎖」。⁴若對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的關係加以深入探討則可使中國近世社會史的研究更具連續性。

元朝是中國史上的一個特殊朝代——第一個由遊牧民族所建立而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而其所統治的則是一個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元廷為永保蒙古人的統治權，乃制定族群等級制度，賦予蒙

1 E. A. Kracke, Jr.,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 (1947), pp. 103-121;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0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 pp. 365-442;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 關於元朝科舉制，參閱丁崑健，元代的科舉制度，《華學月刊》，124 (1982)，頁 46-57，125 (1982)，頁 28-51；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6 (1982)，頁 25-69；劉元珠，元代儒吏關係：延祐之開科與抑吏，《慶祝王鐘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頁 432-440。

4 蕭啟慶，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收入蕭啟慶，《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 155-201；蕭啟慶，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元史論叢》，第 7 輯(1999)，頁 1-19；桂栖鵬，元代進士仕宦研究，《元史論叢》，第 6 輯(1997)，頁 68-95。

古、色目、漢人、南人等四大族群不同的權利和義務。蒙古、色目是征服族群與準征服族群，享受種種優待，而漢人、南人則為被征服族群，備受歧視。⁵

元朝的科舉制度是當時特殊政治社會結構的忠實反映。在中國科舉史上，元朝是第一個兼採族群與區域兩種配額以選取進士的朝代。過去唐宋時代，固無族群配額，即在征服王族時代也無此規定。元朝卻因族群等級的考量而制定科舉中的族群配額。蒙古、色目雖然人口甚少，在科舉中卻享有與漢人、南人相等的配額。據規定，科舉之鄉試在全國 17 處舉行，各處皆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大族群配以一定錄取名額，全國共錄取鄉貢進士 300 人，四大族群各 75 人。經會試、廷試後，錄取進士 100 人，左右榜各 50 人，右榜取蒙古、色目進士各 25 人，左榜取漢人、南人進士各 25 人。充分反映蒙古、色目為備受優遇的兩個族群。而蒙古、色目進士之存在可說是元朝科舉制度的一大特色。

元代蒙古、色目進士的社會、族群及文化背景皆與漢人、南人差異極大。因而，探討蒙古、色目進士的背景不僅具有社會意義，而且更具有族群及文化意義。從社會觀點而言之，科舉取士原是與門第社會互為消長，科舉興而門第消。元朝卻是中國近世史上最重門第的時代，在蒙古、色目兩個族群中尤其如此。元朝選官用人，最重「根腳」，亦即著重門第。蒙古、色目族群中，「大根腳」門第比比皆是，「大根腳」子弟享受甚多蔭襲特權，高官貴爵之取得較為容易。在根腳門第之外，蒙古人大多編為軍戶，世代皆為軍人，而且在平宋以後，奮身疆場，立功昇官的機會已經不多，蒙古族群的社會結構因而呈現兩極化現象。色目人中則有軍人、商賈、教士、工匠等。⁶其中商賈轉化為官員的機緣較多，教士、工匠等則少有此類機緣。總之，蒙古、色目族群中，社會階級分化較漢族更為嚴重，科舉對根腳與非根腳子弟所起作用有何差異，值得特別注意。

從族群與文化觀點言之，蒙古、色目與漢族屬於不同民族，文化亦相互歧異。元朝科舉卻是以漢文與漢學為考試內容，蒙古、色目人必須熟諳漢文與漢學始有登第之可能，因而，能否登第與其族群之文化背景及漢化快慢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而家族婚姻關係對其子弟漢化程度及登科的機率具有重

5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8），頁 25-62。

6 羅賢佑，《元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頁 127。

要影響，亦是值得探討的因素。因而，本文擬自家族仕宦經歷、族群分布、與婚姻關係等三方面來探討蒙古、色目進士的背景與登科的關係。

表一 蒙古色目進士可考人數*

科次	族別	蒙古	色目	族不詳	合計
元統元年		25	25	0	50
十五科		40	71	79	190
總計		65	96	79	240

* 至正11年科蒙古色目進士可考者36人，現僅知其中一人為蒙古，三人為色目，其餘32人皆列入後期「族不詳」。

過去缺少相關的研究，主要由於元朝之進士錄有待重構，⁷元朝科舉前後共有16科，現有完整進士錄傳世者僅有元統元年（1333）一科。⁸在重構其他15科進士錄之前，無法全盤掌握各科進士之名單、族屬、里貫及祖先仕宦經歷等資料，便不能對進士的家庭背景作出有系統的研析。幸而筆者多年來從事的進士錄重構工作已近完成，可資研討。⁹本文即係根據《元統元年進士錄》及筆者重構的其他各科進士錄而撰寫。由於現存資料的侷限，進士錄重構的結果仍不盡理想。元代科舉共錄取進士1,139人，蒙古、色目進士約近500人。由表一可知，除元統元年所取50人外，其他各科蒙古、色

7 錢大昕曾肆力重構元朝進士錄，惜未完成，其初稿為《元進士考》，稿本度藏於北京圖書館，今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5冊，頁1-137。近年來陸續有學者對元朝進士錄作了部分重構工作：陳高華，元泰定甲子科進士考，收入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48-164；桂栖鵬、尚衍斌則對色目進士資料加以輯考，見所撰元代色目人進士考，《新疆大學學報》，1994：2，頁72-78；桂栖鵬，元代科舉中的高麗進士，杭州大學《韓國研究》，第2輯（1997），頁108-116。

8 蕭啟慶，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食貨月刊》（復刊），13：1/2（1983），頁72-90；13：3/4（1983），頁47-62。又可參看王頤點校，《元統元年進士錄》，收入《廟學典禮·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171-226；楊訥，關於《元統元年進士錄》的版本與校勘，收入《祝賀楊志功教授八十壽辰中國史論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頁329-333。現存元朝進士錄，除元統元年進士錄外，尚有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但該記出於國子監石刻，只有進士姓名和甲第次序，並無里貫、族屬、家世的記載，見蕭啟慶，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校補，《食貨月刊》（復刊），16：7/8（1987），頁69-84。

9 進士錄重構為筆者國科會計畫「元代科舉與社會：研究與史料」之一部分，執行期間為民國86年8月至88年7月。

目進士現尚可考知者有 190 人，兩者合計共 240 人，略少於原錄取總數的一半。這 240 名蒙古、色目進士的背景便是本文研析的對象。

二、仕宦

家族仕宦經歷的有無與多寡，向來是研究科舉與菁英流動關係的重要指標。進士是否為官場新血，須自其家族有無「仕宦」背景的角度加以考察。表二、表三乃是根據《元統元年進士錄》及筆者重構的其他 15 科進士錄而製作。在表二及表三中，將元統元年一科與其他 15 科分列，乃因元統元年一科之主要史料的性質與其他 15 科不同。元統元年科有《進士錄》為依據，而《進士錄》所提供之進士名單及家庭背景甚為完整，而其他各科資料係經輯錄而來，缺漏極多，兩者不可混為一談。將元統元年科分列，有助於檢證 15 科統計的正確性。

表二 蒙古色目進士家庭背景

	背景	族別			合計
		蒙古	色目	族不詳	
元 統 元 年	仕宦	14 (58.3)	17 (68)	0 (0)	31 (63.3)
	布衣	10 (41.7)	8 (32)	0 (0)	18 (36.7)
	合計	24 (100)	25 (100)	0 (0)	49 (100)
	缺載	1	0	0	1
十 五 科	仕宦	13 (100)	37 (97.4)	1 (100)	51 (98.1)
	布衣	0 (0)	1 (2.6)	0	1 (1.9)
	合計	13 (100)	38 (100)	1 (100)	52 (100)
	缺載	27	33	78	138
合 計	仕宦	27 (73)	54 (85.7)	1 (100)	82 (81.2)
	布衣	10 (27)	9 (14.3)	0 (0)	19 (18.8)
	合計	37 (100)	63 (100)	1 (100)	101 (100)
	缺載	28	33	78	139
總計		65	96	79	240

表二旨在顯示進士家庭之仕宦與非仕宦背景。此表之製作以家族為單位，凡進士之曾祖、祖父、父親中有一人具有仕宦背景者，該家即列入「仕宦」，若無，則列為「布衣」。三代祖先雖無明確仕宦紀錄，但若史料中顯示該家為「屢世簪纓」、「出身閥閱」及「勳臣之後」，則亦列入「仕宦」。

表二顯示：在現知蒙古、色目進士 240 人中，家世可考者 101 人。其中來自仕宦家庭者，多達七、八成之多（蒙古、色目進士分別為 73% 及 85.7%），而出身布衣家庭者不過一、二成（27% 及 14.3%），但是表二顯示元統元年科進士出身仕宦之家的比率遠低於其他 15 科。出身於仕宦家庭之元統元年科進士佔 63.3%，而其他 15 科之蒙古、色目進士則有 98.1% 來自官宦家庭，兩者差異甚大。此一差異當係反映統計 15 科進士所根據資料本身的缺陷。15 科進士因為家庭背景缺乏記載而未列入統計者為數龐大。依常理推測，缺少記載之家庭，布衣背景者應多於仕宦。而《元統元年進士錄》記載該科進士家庭的資料較為完備，所反映者應近實情，亦即出身仕宦家庭之進士應為六成有餘，而來自布衣家庭者亦有三成多。

表三 蒙古色目進士祖先官職

期別	族		蒙古	色目	族不詳	合計
	仕					
元 統 元 年	高官		5 (7.8)	9 (12.5)	0 (0)	14 (10.3)
	中官		19 (29.7)	15 (20.8)	0 (0)	34 (25)
	低官		7 (10.9)	8 (11.1)	0 (0)	15 (11)
	蒙制官		2 (3.1)	3 (4.2)	0 (0)	5 (3.7)
	官不詳		0 (0)	4 (5.6)	0 (0)	4 (2.9)
	未仕		31 (48.4)	33 (45.8)	0 (0)	64 (47.1)
	合計		64 (100)	72 (100)	0 (0)	136 (100)
	缺載		11	3	0	14
	總計		75	75	0	150
十 五 科	高官		9 (34.6)	34 (39.5)	0 (0)	43 (38.1)
	中官		6 (23.1)	17 (19.8)	1 (100)	24 (21.2)
	低官		5 (19.2)	5 (5.8)	0 (0)	10 (8.8)
	蒙制官		4 (15.4)	16 (18.6)	0 (0)	20 (17.7)
	官不詳		0 (0)	3 (3.5)	0 (0)	3 (2.7)
	未仕		2 (7.7)	11 (12.8)	0 (0)	13 (11.5)
	合計		26 (100)	86 (100)	1 (100)	113 (100)
	缺載		88	136	233	457
	總計		114	222	234	570
總 計	高官		14 (15.6)	43 (27.2)	0 (0)	57 (22.9)
	中官		25 (27.8)	32 (20.3)	1 (100)	58 (23.3)
	低官		12 (13.3)	13 (8.2)	0 (0)	25 (10)
	蒙制官		6 (6.70)	19 (12)	0 (0)	25 (10)

總	官不詳	0 (0)	7 (4.4)	0 (0)	7 (2.8)
	未仕	33 (36.7)	44 (27.8)	0 (0)	77 (30.9)
計	合計	90 (100)	158 (100)	1 (100)	249 (100)
	缺載	99	139	233	472
	總計	189	297	234	720

表三進一步顯示蒙古、色目進士家庭的實際仕宦狀況。本表係以進士的個別祖先為計算單元。240名蒙古、色目進士前三代祖先共有720人，經歷可考者為249人。在此249人中，具有仕歷者近七成，未仕者約佔三成(30.9%)。而在曾經出仕者之中，以擔任中官者為最多(23.3%)，任高官者約略相當(22.9%)，擔任低官及蒙制官者各佔百分之十，遠少於曾任中、上官職者。另有少數祖先雖曾出仕，但其官職現已無法知曉(2.8%)。

表三中的元統元年進士祖先擔任高官者遠少於其他15科(15科與元統元年科分別為10.3%與38.1%)，而未仕者則超過15科進士祖先甚多(分別為11.5%及47.1%)。兩者歧異之由來，除上述緣由外，另一原因為：《元統元年進士錄》所記祖先官歷(父親一輩最為相關)皆為進士登第時之職務，而採自碑傳的15科進士祖先的官職則為其最高職位，兩者自有很大出入。

雖然有關元統元年科與其他15科進士祖先的仕進資料頗有軒輊，但皆顯示蒙古、色目進士大多來自仕宦家庭，而其三代祖先曾任中、上官職者比比皆是。為何甚多蒙古、色目進士出自屢世簪纓的名門貴族是一值得探討的課題。蒙古、色目世家子弟原是族群與根腳制度下的寵兒，為何必須在場屋之中與布衣寒士一爭短長？此一現象必須自元朝官制尋求解釋；元朝雖然重視族群與門第之差別，但對蔭襲特權仍有限制，蒙古、色目世家子弟並不能人人盡得高官貴爵。忽必烈定制以後，武官子孫可以承襲，文官後裔僅可承蔭，且限一名，並又規定「若有餘子，不得於官府自求職事，諸官府亦不許任用。」¹⁰雖然此種規定有如具文，難以貫徹。而且「根腳深重」之家，除子弟一人蔭襲父職外，餘子往往亦可進入「怯薛」(Kesig)，¹¹擔任皇家侍衛，然後便可出仕，官職可高可低。但是，此一終南捷徑，即在高門子弟中，亦非人人可得。就讀國子學與應試科舉便成為長子以外的官宦子弟入仕的補救途徑。以致甚多高門華族子弟皆以科舉晉身官場。現以下列五例具體

¹⁰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83 選舉志，頁2060。

¹¹ 蕭啟慶，元代的宿衛制度，收入《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59-111；片山共夫，怯薛と元朝官僚制，《史學雜誌》，92：12(1980)，頁1-37。

說明蒙古、色目高門子弟不得不在蔭、襲之外別以科舉為入仕之途徑的原因：

(一) 變理溥化，出身蒙古斡羅納兒氏世家。五世祖啟昔禮在成吉思汗朝立有大功，獲任為千戶並封答刺罕。曾祖曩加台，事蒙哥汗為近侍。從祖哈刺哈孫(1257-1308)在成宗時代任中書右丞相，位極人臣。¹²變理溥化與哈刺哈孫共曾祖，其祖、父二代事跡不詳。¹³但虞集題變理溥化編撰《斡羅氏世譜》說：哈刺哈孫「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¹⁴即指變理溥化輩而言，可見在經濟及政治上業已困頓。

(二) 月魯不花(1308-1366)與其弟篤列圖出身蒙古遜都思氏名門，分別為元統元年(1333)與至正5年(1345)進士。五世祖赤老溫為成吉思汗的「四傑」之一。¹⁵四傑皆為成吉思汗最親密的勳臣，子孫世代金紫相繼，位列王相。元人稱此四家為「大根腳」。其中赤老溫家較為隱晦，但仍不失為中上等的官宦世家。月魯不花兄弟之曾祖察刺月里從窩闊台汗經略中原，官至隨州達魯花赤。祖忽訥以萬戶平宋有功，轉任江西肅政廉訪使。忽訥卒後當係由長子式列烏台承蔭。次子脫帖穆耳(1265-1344)即月魯不花之父，以勳家子得以供職怯薛，後任千戶所達魯花赤，鎮守明州、越州。¹⁶長子大都襲千戶之職。月魯不花與篤列圖分別為其三、四子，自無襲職可能，遂由科舉入仕。

(三) 孛顏忽都，欽察族玉耳別里伯牙吾台氏，泰定4年(1327)進士。其家出身軍伍，早期不算顯赫。曾祖忽都思，位不過管軍百戶，祖和尚襲父職，從平宋，官至浙西提刑按察使。¹⁷父千奴承襲父職。武宗即位之際，有定策功，拜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地位極高。孛顏忽都為千奴之第五子，由於其四位兄長皆已出任御史、萬戶等職，孛顏忽都乃以科舉進身。¹⁸

¹² 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卷40 斡羅氏世譜序，頁3上-3下。

¹³ 關於哈刺哈孫及其家族的歷史，參看劉敏中，《中菴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卷4 順德忠獻王碑，頁295-298；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收入《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頁124-125及頁129-130。

¹⁴ 《道園學古錄》，卷40 題《斡羅氏世譜》，頁3下。

¹⁵ 關於此一家族在元朝的興衰，參看蕭啟慶，元代蒙古四大家族，收入《元代史新探》，頁141-230。

¹⁶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卷35 遜都台公墓誌銘，頁5下-11上；《元史》，卷145 月魯不花傳，頁4下-8上。

¹⁷ 《元史》，卷134 和尚傳，頁3256-3259。

¹⁸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四部叢刊)，卷24 孛元卿墓志銘，頁16下-17上。

(四) 答祿守禮、守恭、與權為叔姪，出身於答祿乃蠻氏名族，分別為泰定4年(1327)至順元年(1330)至正2年(1342)進士。守恭、守禮兄弟為乃蠻塔陽罕弟屈出律五世孫。屈出律之子，亦即守恭輩之曾祖抄思(1205-1248)是由成吉思汗二皇后古兒別速扶養成人。後授萬戶，鎮潁州。其子別的因(1229-1309)官至台州路達魯花赤。別的因子四人，已有二人未仕。¹⁹守恭、守禮一輩中，長兄孛蘭奚用別的因之蔭為宣城縣達魯花赤，秩不過七品。守恭、守禮遂由科舉入仕。在下一輩中，與權行三，亦無承蔭機會，不得不由科舉出身。²⁰

(五) 廉惠山海牙與廉方皆出身畏兀兒人中極為顯赫的高昌廉氏家族，分別為至治元年(1321)與元統元年(1333)進士。²¹廉方之曾祖布魯海牙(1197-1265)為忽必烈之母唆魯忽帖尼的家臣，與皇家關係密切，官至順德路宣慰使。²²布魯海牙子孫中以廉希憲(1231-1280)地位最高，為忽必烈朝著名儒相。但是，廉氏宗支繁衍，布魯海牙有13男，53孫。孫輩以下，人數更多，自不能人人得官，即在希憲兄弟一輩中，已有多人未曾任官。廉方之祖，名字已佚，應為希憲昆季。《元統元年進士錄》載其官爵為「口陽郡侯」，顯為封贈。父廉甫，散官資品為將仕郎，不過是八品卑秩。²³廉方之入國子學並由科舉入仕，並不意外。而惠山海牙為廉方之伯叔輩，父阿魯渾海牙任廣德路達魯花赤，早卒，惠山海牙亦由科舉入仕。²⁴

至於中門以下的蒙古、色目子弟，須以科舉為進入仕宦之一途徑更為自然。蒙古人中，如延祐5年(1318)右榜狀元忽都達而(1296-1349)，為蒙

19 《元史》，卷121 抄思傳，頁2292-2295；《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8 答祿乃蠻氏瑩碑，頁12上-17下。

20 關於答祿與權，參看《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136 答祿與權傳，頁7下；楊鑣，答祿與權事跡勾沉，《新疆大學學報》，1993：4，頁97-103；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136、164。

21 關於高昌廉氏，參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北平：勵耘書屋，1934)，卷2，頁9下-10上；Hsiao Ch i-ch ing, "Lien Hsi-hsien," in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ed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Wiesbaden: Harrasowitz, 1993) pp. 480-499；王梅堂，元代內遷畏兀世家 廉氏家族考述，《元史論叢》，第7輯(1999)，頁123-136。

22 《元史》，卷125 布魯海牙傳，頁3070-3072。

23 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 上，頁81。

24 《元史》，卷145 廉惠山海牙傳，頁3447-3448。

25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7 捏古公神道碑，頁13上-16上。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

古捏古思氏。其祖火者，任泰興縣達魯花赤，官不過從六品，父阿散，未仕，護都達兒因而無法由蔭襲入仕。²⁵泰定4年(1327)進士哈刺台，哈兒柳溫台氏，為中千戶所達魯花赤馬馬之孫。²⁶元制武官官位可由子孫承襲，馬馬所任中戶所達魯花赤之位先由哈刺台父輩彥智傑承襲。哈刺台輩共有兄弟七人，哈刺台行四，千戶職位由其五弟奧魯帖木兒承襲，其餘六人中，有四人「治進士業」，皆欲由科舉入仕，唯有哈刺台登進士第。色目人中，教化，西夏人，亦為泰定4年進士。²⁷其祖述哥察兒，官至濟州達魯花赤，父哈刺哈孫，任漢陽府達魯花赤，為四品之官。子孫承蔭應為八品。教化在兄弟三人中為季弟。其仲兄納嘉德承蔭為縣達魯花赤。教化遂由科舉入仕。

下層官員子孫以科舉來增加入仕機會的需求自然更為迫切。下列蒙古進士泰不華(1304-1352)、完迓溥花、完迓口先(?-1305)，色目進士安住、邁里古思(?-1358)、袁州海牙等人皆可為例。泰不華，蒙古伯牙吾台氏，至治元年(1321)進士。父塔不台，任台州路錄事判官，不過從八品卑職。²⁸完迓溥花、完迓口先兄弟，蒙古忙古台氏，分別為泰定元年(1324)及元統元年(1333)進士。祖張撞忽，任景陵縣主簿，父保，承事郎，分別為從八品與從七品官職。安住，泰定元年(1324)進士，西夏人。父阿闐，出身吏員，官至中衛千戶所知事，階不過從八品。²⁹邁里古思，亦西夏人，至正14年(1354)進士，其碑傳中雖言其父「官於杭州」，但未明言其官職，又言其「家貧，授徒以養母」，其父應為卑職小官。³⁰而袁州海牙，畏兀兒人，至正5年(1345)進士，其祖任袁州稅務大使，亦僅為八、九品之職。³¹這些八、九品官員子弟即得恩蔭，亦是流外雜職，自不及科舉出身之優渥。

頁115-116。

26 蘇天爵，《滋溪文稿》(陳高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21 元故贈長葛縣君張氏墓志銘，頁359-361。

27 熊象階，《濟縣金石錄》(石刻史料新編)，卷下，吳澄，濟州達魯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頁19上-21上；任崇岳，元濟州達魯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釋，《寧夏社會科學》，1995：2，頁19-22。

28 《元史》，卷143 泰不華傳，頁3423-3426。

29 張古，《嘉靖內黃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坤卷，楚惟善，安住去思碑，頁28上-30下。

30 《元史》，卷188 石抹宜孫傳 附 邁里古思傳，頁4311-4312；《東維子文集》，卷24 西夏侯邁公墓誌銘，頁6上-7下。

31 徐璉，《正德袁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卷8 人物志，頁11下-12下。

32 關於高昌僕氏，參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2，頁28下-39下；蕭啟慶，蒙元時代高

科舉的施行對那一類家庭最為有利？定居中原較早，漢化較深的中、上層蒙古、色目文官家族子弟顯然最易於躍登進士第，在科舉恢復後最初幾科尤其如此，遂造成父子兄弟接踵登科的現象。色目人中的畏兀兒族僕氏、廉氏、汪古族馬氏、康里太禧奴家族、唐古斡玉倫徒家族，蒙古人中答祿乃蠻氏、遜都思氏皆可為證。

僕氏、廉氏、馬氏都是元朝初期即已漢化之色目家族。高昌僕氏祖先歷經突厥、回紇、畏兀等國，皆為「國相」，可說是內陸亞洲史上顯赫最為持久的世家，亦屬本國知識菁英階層。³² 僕氏入華第一代之岳璘帖穆爾(?1196-?1262)在成吉思汗季年任河南等處達魯花赤，其家因而徙居中原，岳璘帖穆爾之子哈刺普華(1246-1284)幼年即習「畏兀書及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³³其時約在蒙哥汗時代，當時蒙古、色目人研習漢學者尚不多見，僕氏可說是其中先驅。大德(1297-1307)中，哈刺普華之子僕文質任江西行省理問，其家遂徙居隆興(南昌)，延師教授子姪，「書聲琅琅東湖之上，晝夜不絕」，³⁴有如江西名儒劉岳申所說：「親見元帥奉親教子，當時豈知後有科舉興？蓋十年貢舉始行。貢舉行而僕氏一家兄弟如拾芥，此天也。」可見僕氏以漢學教育子弟早於科舉十年，因而其子弟在科舉恢復之後，取金紫如拾芥。文質之子僕玉立(延祐5年〔1318〕進士)、僕直堅(泰定元年〔1324〕)、僕哲篤(延祐2年〔1316〕)、僕朝吾(至治元年〔1321〕)及其姪善著(泰定4年〔1327〕)於六科之間，接踵登第，一時傳為美談，號為「六桂」。其後文質之孫輩僕百遠遜(?-1360，至正5年〔1345〕進士)姪孫正宗(至正5年〔1345〕)、阿兒思蘭(至正8年〔1348〕)亦相繼上榜。而百遠遜之弟僕帖該亦中鄉貢進士。故僕氏兩代之間，登進士第者九人，中鄉試者一人，遂成為元代最為成功的科第世家。延祐首科出身的名臣許有壬(1287-1364)稱讚僕氏說：「唐宋科舉盛時，儒家世科，未有如僕氏一門兄弟之盛，天下傳為美談。」³⁵

與僕氏相較，汪古馬氏僅略為遜色。³⁶汪古為遼金以來居住陰山以北的

昌僕氏的仕宦與漢化，收入蕭啟慶，《元朝史新論》，頁243-297。

³³ 歐陽玄，《圭齋文集》(四部叢刊)，卷11 高昌僕氏家傳，頁3上-11上。許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54 合刺普華墓志銘，頁49上；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5 合刺普華神道碑，頁1上-5下。

³⁴ 劉岳申，《申齋文集》(中央圖書館影舊抄本)，卷5 三節六桂堂記，頁8下。

³⁵ 《至正集》，卷25 合刺普華公墓誌銘，頁50上。

³⁶ 關於馬氏家族歷史及祖常生平，參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2，頁17下-24上；馬祖

突厥語部族。因其居處於草原與農業地區邊緣，與中原往來密切，其中早有漢文士人存在。延祐 2 年（1315）進士馬祖常、祖孝之高祖馬慶祥（1178-1223）於金季仕至鳳翔兵馬判官，「善騎射而知詩書」，顯然熟諳漢文。³⁷曾祖馬月合乃（1216-1263）於蒙哥汗時代即以拯救流亡之儒士知名。³⁸祖常稱他「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³⁹可見月合乃深通漢學。他又羅致名儒敬鉉教授子弟。月合乃之孫，亦即祖常、祖孝之父馬潤（1255-1313）係以「文墨入官」，著有《樵隱集》，為一詩人。⁴⁰此時馬氏顯然已以漢文全面教育子弟，以致在科舉恢復之後，祖常、祖孝兄弟聯翩成首科進士，⁴¹此後，祖常之諸父世德登至正 2 年（1342）第，⁴²從弟祖善亦為進士，科次不詳。⁴³至順元年（1330）進士金哈刺亦出於馬氏一族。⁴⁴此外，由國子學公試入仕亦即所謂「國子進士」者尚有祖謙、祖憲、獻子等人，人數之多幾可與僕氏比美。蘇天爵稱馬氏：「初尚書（月合乃）有子十一人，孫二十人，曾孫三十餘人，或執業成均，擢進士第，皆清謹文雅，為海內衣冠閥族」，⁴⁵可見馬氏為著名的書香科第世家。

高昌廉氏也是一個漢化先進而產生幾名進士的文官家庭。廉氏之始祖布魯海牙（1197-1265）早在窩闊台汗 3 年（1231）已任燕南廉訪使，定居中原。諸子中，廉希憲（1231-1280）係受忽必烈刻意培養的漢學人才。早在乃馬真皇后稱制三年（1244），忽必烈即已命希憲從金狀元王鶚（1190-1273）

常，《石田先生文集》（李叔毅、傅瑛點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附錄：馬祖常年譜；王佑夫、周紹祖，馬祖常及其詩歌創作，《新疆大學學報》，1988：4，頁 89-95；楊鐮，馬祖常：元詩史的也里可溫，收入楊氏，《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頁 331-337。

37 脫脫等，《金史》（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124 忠義傳，頁 2695-2696；元好問，《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卷 27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頁 638-641。

38 《元史》，卷 134 馬月合乃傳，頁 3244-3246。

39 《石田先生文集》，卷 13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頁 236-239。

40 袁楠，《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卷 26 馬公神道碑，頁 16 上-20 上；《石田先生文集》，卷 13 梁郡夫人楊氏墓志銘，頁 245-246。

41 《石田先生文集》，卷 13，頁 245-246。

42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43 馬氏世譜，頁 1 上-3 下。

43 同上註，頁 6 上。

44 蕭啟慶，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遊寓興詩集》，收入蕭啟慶，《元朝史新論》，頁 299-322。

45 《滋溪文稿》，卷 29 題馬氏蘭蕙同芳圖，頁 499。

46 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四部叢刊），卷 65，元明善，廉文正王神道碑，頁 1 上-16 下。

學，希憲篤好經史，忽必烈稱之為「廉孟子」。⁴⁶希憲諸昆仲子姪皆受良好儒家教育。希憲八弟希貢便是著名書法家。⁴⁷以後廉氏極重家庭教育，而且藏書豐富，以致子孫受漢文化薰陶極深。雖然廉氏在元代政治上聲望甚盛，子弟多可由蔭襲入仕，但仍產生了廉惠山海牙與廉方等二名進士。

幹玉倫徒（都）與太禧奴亦出身於漢化較早的色目官宦家族。幹玉倫徒，科次不詳，出身於西夏最為著名的儒學世家，五世祖幹道沖於西夏仁宗時為該國中書宰相。高祖幹扎篲，掌國史，歸降蒙古為中興路管民官，祖朵兒赤，官至雲南廉訪使，父幹仁通則任雲南行省理問。⁴⁸幹玉倫徒肄業國子學，以《禮記》登進士第，並長於詩、書。⁴⁹

太禧奴，至正 14 年（1354）進士，也是出身於元朝一個最重要之漢化政治世家。⁵⁰其家原為康里部大人。太禧奴之高祖燕真為忽必烈的親密家臣。曾祖不忽木（1254-1300）係由忽必烈精心栽培，也是最早的國子學生，大儒許衡弟子。是至元晚期與元貞、大德時期之儒相，亦為散曲家。⁵¹祖回回（1291-1341），叔祖巉巉都是元朝中後期的名臣，亦是名重一時之書法家。其家漢學傳統極為深厚，自較一般蒙古、色目子弟更易躍登進士第。

進士出身的家庭亦有不少係由將門轉化為士族。這種轉化有的在平宋後即已開始，有的則始於科舉恢復之後。前述答祿守禮、孛顏忽都及月魯不花等家族都是先後由軍官家庭轉化為士人家庭。守禮、守恭之曾祖別的因在平宋前後已由武職轉任文官，歷任各府路達魯花赤。其子囊家台「有隱德」，「篤學而尚志」，取答祿為漢姓，文圭為其漢名，又取「章瑞」、「橫溪」等字號，顯然已士人化。⁵²其子姪守禮、守恭，其孫與權相繼成為進士，與其家族之文士化自有因果關係。孛顏忽都之祖和尚也是在平宋後由軍職轉任文

47 陶宗儀，《書史會要》（影刊洪武九年本），卷 7，頁 17 上。

48 《元史》，卷 134 朵兒赤傳，頁 3254。《道園學古錄》，卷 4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頁 21 上。

49 《書史會要》，卷 7，頁 18 下；《元西域人華化考》，卷 4，頁 54 下、卷 5，頁 79 下。

50 關於此一家族，參看《元西域人華化考》，卷 2，頁 10 上-11 上，卷 4，頁 81 上-82 下；楊鐮，不忽木及康里詩人，收入楊氏《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頁 36-56；王乃棟，康里子山的族屬及其書法藝術的探索，《新疆社會科學》，1985：4，頁 117-121。

51 趙孟頫，《趙孟頫集》（任道斌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 7 文貞康里公神道碑，頁 158-161。

52 方回，《桐江續集》（四庫全書），卷 27 題答祿文圭淨香亭，頁 15 下；任士林，《松鄉文集》（四庫全書），卷 2 淨香亭記，頁 3 下-4 上。

53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35 千戶遜都台公神道碑，頁 9 下-10 上。

職。

亦有不少進士出身於武官家庭。其家或因徙居中原已久而土人化，或因受科舉制度施行之激勵而開始教子讀書。蒙古進士中的月魯不花、篤列圖家族，色目進士中的薩都刺、完澤溥化家族皆可為例。月魯不花、朵列圖之父脫帖穆耳，由於久戍江南，漢化漸深。據說他「講閱之暇，日與賢士大夫遊，懸弓箭著壁間，聚古今圖書列左右，延名師教其子」，黃潛說他「息馬投戈，以文易武」，可謂寫實。脫帖穆耳命諸子皆從紹興名儒韓性（1266-1341）遊，以致月魯不花及朵列圖榮登進士第。⁵³ 薩都刺之祖思蘭不花，受知忽必烈，「命仗節鉞」，父阿魯赤，英宗朝留鎮雲代，可見薩氏祖先始終擔任軍職。⁵⁴ 薩都刺為元朝最負盛名的大詩人，而其姪仲禮，亦中鄉貢進士。而泰定元年（1324）進士完澤溥化（漢名沙德潤）之家族更是由武將家族轉化為科第世家的最好代表。曾祖沙的從成吉思汗伐金。祖抄兒赤（漢名沙全），官至松江萬戶府達魯花赤，其家遂居松江。⁵⁵ 其子某應是承襲萬戶府達魯花赤之職。溥化諸弟姪在至正間登鄉貢多達四人。⁵⁶ 雖然科第之顯赫不及高昌僕氏、汪古馬氏，但薩氏、沙氏皆可算是在科舉恢復後奮起讀書直接由武將家庭成功轉化的新士族。

官宦子弟雖然在科舉中佔有優勢，但是有如《元統元年進士錄》所顯示，仍有不少蒙古、色目進士出身布衣之家。這些布衣家庭的性質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而此一探討必須將進士家庭的戶計類別列入考慮。

「戶計」是元代戶役制度的一部分。⁵⁷ 全國人戶皆經僉定，為國家承當特定的差役。諸色戶計如軍、民、匠、站、儒等戶，都本著「籍不准亂，役皆永充」的原則，世守其業，權利、義務相去甚大。因而戶計類別是影響子弟讀書、仕進的一個重要因素。《元統元年進士錄》列有各族進士戶計類

54 薩都刺，《雁門集》（殷孟倫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401-402，附錄·干文傳序。關於薩都刺，參看，《元西域人華化考》，卷4，頁63下-65上。張旭光，薩都刺生平仕履考辨，收入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元代》（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頁372-405。

55 《元史》，卷132 沙全傳，頁3217-3218。

56 顧清，《正德松江府志》（《中國方志叢書》，採明正德七年刊本），卷25 科貢，頁458。

57 黃清連，《元代戶計制度》（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77）；高樹林，《元代賦役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1997），頁127-221。

58 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 上，頁74-81；蕭啟慶，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頁142-148。

59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四部備要），卷40 余左丞傳，頁17下。

別，便於研討。至於其他 15 科進士家庭所屬戶計已難以探究。

就元統元年科而言，⁵⁸ 25 名蒙古進士中，現知其戶計者 11 人，全部出身軍戶。色目進士 25 人中，現知其家庭戶計類別者僅 8 人。其中軍戶出身者也多達 6 人（75%）。顯然元代進入中原之蒙古、色目人，除去任官者外，大多納入軍戶，以作政權之保障。蒙古軍戶 11 戶中，僅三戶具有仕進紀錄，色目軍戶六戶中，也僅有三戶為官宦家庭。其餘當為普通士兵家庭。如右榜狀元同同，出身蒙古口口歹氏，真定路錄事司侍衛軍戶，祖先三代全無仕進紀錄，顯然出於普通軍戶之家。同科蒙古進士阿虎歹、博顏歹、護都不花、柏延烏台、脫穎，色目進士野僊普化、明安達耳等皆是如此。即使在元統元年科之中，《進士錄》雖未有記載但實際是出身於普通軍戶之家者亦不乏其人。右榜第二名余闕（1303-1358）便是出身廬州西夏軍人社區。宋濂 余左丞傳 雖稱其父沙刺藏卜「曾官合肥」，⁵⁹但在《進士錄》中三代皆無仕歷，顯然為一普通軍戶。

從以上探討看來，元代的科舉中，蒙古、色目官宦家庭佔有甚大優勢。官宦家庭子弟登第者之比率遠高於布衣子弟。高級文官而漢化較早的家庭顯然獲利最大，造成父子叔姪聯翩登第的現象。但是，蒙古、色目進士中亦有二、三成來自布衣家庭，大多出身普通軍戶，為原甚閉鎖的蒙古、色目統治菁英階層注入一些新血。

三、族群分布

在元代科舉中，蒙古、色目雖各享有一定配額，但在族群之內的各民族或部族並無配額限制。各民族或部族錄取進士人數的多寡應反映該族漢化之快慢，而其漢化之快慢又與其原有文化水平及在元朝之地位具有關聯，故有探討之必要。現將有關蒙古、色目進士的族屬資料製為表四及表五。

60 關於高昌回鶻之歷史與文化，參看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國史の研究》（京都：文部省刊行費補助出版物，1954）；A. von Gabain, *Das Leben im uighurischen Konigreich von Qoco, 850-1250*

表四 蒙古進士族群分布

科別 族別	元統元年科 (%)	十五科 (%)	總計 (%)
札刺亦兒	3 (17.6)	0 (0)	3 (8.8)
弘吉刺	2 (11.8)	0 (0)	2 (5.9)
斡羅納兒	2 (11.8)	1 (5.9)	3 (8.8)
塔塔兒	2 (11.8)	2 (11.8)	4 (11.8)
亦乞列思	1 (5.9)	0 (0)	1 (2.9)
燕只吉台	1 (5.9)	0 (0)	1 (2.9)
遜都思	1 (5.9)	3 (17.6)	4 (11.8)
捏古思	0 (0)	4 (23.5)	4 (11.8)
伯牙吾台	0 (0)	1 (5.9)	1 (2.9)
忙古台	1 (5.9)	1 (5.9)	2 (5.9)
札只刺台	1 (5.9)	0 (0)	1 (2.9)
乃蠻	2 (11.8)	3 (17.6)	5 (14.7)
怯烈	1 (5.9)	1 (5.9)	2 (5.9)
哈兒柳溫台	0 (0)	1 (5.9)	1 (2.9)
合計	17 (100)	17 (100)	34 (100)
族不詳	8	23	31
總計	25	40	65

表四所列為蒙古進士 34 人的族屬背景。該表顯示蒙古各部族或氏族所產生之進士頗為平均，多寡相去並不懸殊。事實上，在進入中原之前，蒙古各部大體皆為遊牧民。其中怯烈、乃蠻二部由於位處西蒙古，受到畏兀的影響，文化水平較高。其他各族水平甚為相似。因此，各族的漢化起點可說相同。入元以後，各族成員家族或位列廟堂，或分編於各千戶、萬戶之中，際遇各不相同。而且，現存蒙古各族進士資料不多，主要限於現仍有碑傳資料傳世的各個家族，家族在元朝之地位與文化取向對個人之影響顯然大於部族或氏族。如乃蠻族產生五名進士，三名皆產生於答祿家族，即與其家族文化取向具有密切關聯。

表五 色目進士族群分布

科別 族別	元統元年科 (%)	十五科 (%)	總計 (%)
畏兀	5 (20.8)	24 (36.9)	29 (32.6)
唐古	8 (33.3)	11 (16.9)	19 (21.3)
回回	8 (33.3)	19 (29.2)	27 (30.3)

哈刺魯	3 (12.5)	4 (6.2)	7 (7.9)
汪古	0 (0)	4 (6.2)	4 (4.5)
也里可溫	0 (0)	1 (1.5)	1 (1.1)
欽察	0 (0)	1 (1.5)	1 (1.1)
康里	0 (0)	1 (1.5)	1 (1.1)
合計	24 (100)	65 (100)	89 (100)
族不詳	1	6	7
總計	25	71	96

色目各族進士之多寡則與其本族原有文化背景關聯較大，色目人不是一個民族，而是元廷為統治需要而設定的一個族群，族類極為繁多。色目之「族」的意義與蒙古之「族」全然不同。蒙古之「族」指氏族或部族，而色目各「族」原來或為國家，或為部族，或為宗教。其原有文化水平及其所受漢文化影響之大小相差甚大。這些因素皆影響其族人漢化之快慢與登第之多寡。

根據表五，色目各族，依產生進士的多寡可分為三級：第一級為畏兀（29人）、回回（27人）、唐古（19人）三族。三族合計佔族別可考色目進士的84.3%，可見這三族在科舉中的優勢。第二級為哈刺魯（7人）、汪古（5人）。第三級為欽察、康里、也里可溫，僅各產生進士一人。各族進士的多寡相去甚遠。

畏兀、回回、唐古產生甚多進士的原因各不相同。畏兀自漠北西遷高昌、北庭後改營城廓生活，廣泛吸收西域文化，形成甚高文明，早已擁有世俗及佛教知識分子。⁶⁰加以歸順蒙古甚早，頗受蒙元朝廷重用，而且擔任文職者最多。⁶¹故畏兀人中的漢化家族甚多。產生九名進士的僕氏與產生兩名

(Wiesbaden: Otto Harrasowitz, 1973); 程溯洛, 高昌回鶻王國, 收入程氏, 《唐宋回鶻論集》(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頁236-260。

61 關於畏兀人在蒙元時代之政治地位及漢化, 參看李符桐, 回鶻與元朝建國之關係、畏吾兒人對於元朝建國之貢獻, 兩文收入《李符桐論著全集》, 第3冊, 頁161-270, 頁271-338; 胡其德, 元代畏吾兒人華化的再檢討, 收入《中國邊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 蒙藏委員會, 1995), 頁169-201; Thomas T. Allse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in M.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43-280.

62 關於元代之回回, 參看楊志玖, 元代回族史稿, 發表於《回族研究》1992年至1994年各期; 邱樹森主編, 《中國回族史》(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7), 上冊, 頁112-328; Morris Rossabi,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in John D. Langlois (ed.), *China under*

進士的廉氏便是屬於這類高度漢化的家庭。

元代回回泛指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人，包括大食（阿剌伯）人、波斯人及伊斯蘭化之突厥人。⁶³ 遷入中原者人數之多，在色目各族中名列第一。⁶³ 回回因有伊斯蘭文明為基礎，原有文化水平較高，不少回回人在遷入中原時已是知識分子。而且，元廷對回回頗為重視，在理財、行政方面往往重用。加以，元代回回除去隨蒙軍遷入中原者，尚有唐宋時代「蕃客」、「胡商」的後裔，這些家族早已高度漢化。泰定 4 年（1327）進士蒲里翰、至順元年（1330）進士馬原景都是出身於這類老回回家族。蒲里翰與蒲壽庚同族，⁶⁴ 壽庚家族早已漢化，其兄壽宸為一詩人。而馬原景之家於宋初入華，其祖先在宋代登進士第者十人，武探花者一人，⁶⁵ 早已是一個科第家庭。

唐古氏即原來之西夏人。西夏原為一大國，其地受漢文化影響近千年。⁶⁶ 而西夏亦為一包攏蕃、漢的國家。國中蕃、漢二學並重，而其科舉取士是以儒學為內容，故其本國早已擁有漢文士人階層。⁶⁷ 如斡玉倫徒便是出自西夏著名漢文士人家族，該家族入元之後，仍然歷代仕宦。但因該國抵抗蒙古較烈，歸順以後政治地位不高，其人編入軍伍者甚多，如余闕便是出身戍守合肥的唐古軍人家庭。同科進士伯顏（字魯卿）、明安達耳、塔不歹等也都是唐古軍戶或軍人子弟。軍人身分可能妨害了唐古人讀書登科的機會，以致進士數目不及畏兀、回回。

第二級二族中，有如前文所述，汪古原有漢文士人存在。馬氏家族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故馬氏子弟登科入仕甚為容易。但是，汪古原為人數不多

Mongo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57 - 295.

63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 8 卷第 13 冊，《中古時代·元時期（上）》（陳得芝主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 619。

64 胡謐，《成化河南總志》（成化十二年刊本）卷 10，頁 37 下、卷 16，頁 99 下；顧嗣立，《元詩選癸集》（掃葉山房刊本）癸上，頁 61 上。

65 《懷寧馬氏宗譜》，引見馬肇曾，《懷寧馬氏宗譜》及歷代主要人物考 上，《回族研究》，1998：3，頁 19 - 30。

66 關於西夏的歷史與文化，參看吳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67 白濱，西夏的學校與科舉制度，《西夏文史論叢》（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第 1 輯，頁 17 - 31。

68 關於汪古族，參看周清澍，汪古部事輯，《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集刊》（呼和浩特：中國蒙古史學會，1979），頁 147 - 206。

69 關於哈刺魯，參看陳高華，元代的哈刺魯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1，頁 145 - 154；W.

的一個部族，⁶⁸不過四千車帳，而見之於紀錄者僅寥寥數家，以致登第人數不多。

哈刺魯即唐代之葛邏祿，⁶⁹原為西突厥之一部，居住於巴爾喀什 (Balkash) 海東之海押立 (Qayaligh) 周圍地區。哈刺魯人自 11 世紀後即開始伊斯蘭化，但信仰景教與佛教者亦不乏其人。哈刺魯人兼事農業、牧業與商業，是突厥遊牧民族中文化較高的一族。遷入中原的哈刺魯人大多繫身軍籍，較為集中的屯駐地區有大名路濮陽 (山東河北蒙古都萬戶府駐地) 河南南陽及江浙慶元路等地。危素序迺賢《金台集》稱「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⁷⁰出身元統元年進士的大吉心、丑閻 (字益謙) 託本，15 科進士中的塔海 (慶元) 鐵閻 (慶元)、完澤溥化 (松江) 捏古柏 (慶元) 等皆是出身軍人家庭。

第三級之也里可溫、欽察、康里各僅產生一名進士。原因不盡相同。也里可溫 (Erke ün) 為對基督教徒及教士的通稱，包含族類甚廣。⁷¹也里可溫之原有文化水平因個人所屬族類不同而有甚大差異。也里可溫進士不多乃因不少信仰景教的進士皆以原屬族群見於記載 (如汪古、乃蠻、怯烈)。唯一以也里可溫之稱見於記載的進士雅琥則為一水平頗高的詩人。

康里、欽察原為突厥遊牧部族。康里原居於今烏拉爾河 (Ural, 即押亦河) 以東至鹹海 (Aral Sea) 東北，而欽察則遊牧於南俄欽察草原 (Desht-i Qipchag) 裏海、黑海之北，烏拉爾河與頓河之間。⁷²兩族原有文化不高，與中原殊乏淵源。而且徙入中原的兩族人士大多編入軍旅，因而漢化程度不高，產生進士甚少。唯一的康里進士為至正 14 年科之太禧奴，為不忽木之曾孫、回回之孫。欽察族中之唯一進士孛顏忽都之家原為軍人，但其父千奴已土人化，延祐 5 年自中書平章政事之高位致仕後，創建歷山書院，延

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 I (Leiden: E.J. Brill, 1956) pp. 103-104.

70 危素，《危太僕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 10 迺賢之金台後稿序，頁 5 下 - 6 上。

71 關於也里可溫，參看陳垣，《元也里可溫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論叢》，第 1 輯 (1982)，頁 137-162。

72 關於康里、欽察與阿速，參看陸峻嶺、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里人，《文史》，第 16 輯 (1982)，頁 117-130。

73 傅海波教授云：「吐蕃僧侶似置身中原文化之外，而未能如畏兀兒人一樣從事於中原土人所敬重的一些文化事業」。見 H. Franke, "Tibetans in Yuan China," in John D. Langlois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p. 296-328.

名師教其子弟。李顏忽都遂登泰定 4 年進士第。總之，千禧奴與李顏忽都的背景在其所屬族群中皆甚特殊。

在元代的重要民族中，阿速與吐蕃未見有產生進士的記載。阿速人為原居北高加索山脈（太和嶺）的伊朗種人，「素號精悍，善騎射」，遷徙中原之阿速人皆編入宿衛中，漢化程度較低。吐蕃人可能由於享有特殊的宗教與政治地位，通元一代未見產生士人，也未產生進士。⁷³

總之，色目各族進士之多寡與其本族原有文化水平、移居中原的人口數目及在元朝所處政治地位有關。

四、婚姻關係

元朝未曾禁止異族通婚，而且立法加以規範。⁷⁴事實上，各族間通婚頗為頻繁，而族際通婚不僅促進血緣融合，而且與蒙古、色目人的漢化具有密切關聯。蒙古、色目人與漢人聯姻常促成其家庭之漢化。嫁與異族的漢族婦女中，不少略諳詩書，往往遵循漢人價值觀念，督促子女讀書習文。因而蒙古、色目家庭與漢族聯姻與其在科舉中的成敗之間亦頗有關係。

元統元年及 15 科蒙古、色目進士之家與漢族通婚皆甚普遍。《元統元年進士錄》中載有各進士之母（曾祖母、祖母則多不記載）或妻子所屬族群（如為蒙古、色目人）或姓氏（如為漢人、南人）。⁷⁵例如脫穎（字尚賓）為蒙古札刺亦兒氏，「母姬氏， 娶宋氏」，又如丑閻（字益謙）本人為哈刺魯人，「母康里氏， 娶欽察氏。」若進士未娶，則記作「娶未」。現將蒙古、色目進士的此項資料列為表六。表六中「婚姻對象」各依其種族或姓氏判斷其族群類別。如記作札刺亦兒、康里、欽察類必為蒙古、色目

74 洪金富，元代漢族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食貨》（復刊），6：12（1977），頁 1-19，7：1/2（1977），頁 11-61；池內功，元朝における蒙漢通婚とその背景，載於《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會と文化・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4），頁 218-238；楊志玖，元代回漢通婚舉例，收入楊氏，《元史三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156-162；孟楠，元代西夏遺民婚姻研究，《寧夏社會科學》，1992：2，頁 67-74。

75 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 上，頁 74-81。

76 楊志玖，元代的阿兒渾人，收入《元史三論》，頁 226-236。

77 《滋溪文稿》，卷 15 總管趙侯墓碑銘，頁 248-249。

78 《至正集》，卷 51 漁陽縣男子闡公墓志銘，頁 25 上-26 下。卷 68 哈八石哀辭并序，頁 22

者，因而列入「蒙古、色目」。如記為姬氏、宋氏等漢姓，則列為「漢族」。以姓氏來判斷族別，自然無法絕對正確，但與事實應該相去不遠。凡姓氏或氏族脫落者則列入「缺載」。因本表旨在說明聯姻漢族有助於蒙古、色目人之登第，凡一人娶兩次妻以上而其中一人為漢族者即列入漢人計算。

表六 元統元年蒙古色目進士家庭之婚姻

族別 婚姻 對象	蒙古		色目	
	母	妻	母	妻
漢族	15 (68.2)	10 (71.4)	12 (54.5)	7 (50)
蒙古色目	7 (31.8)	4 (28.6)	10 (45.5)	7 (50)
總數	22 (100)	14 (100)	22 (100)	14 (100)
未娶	0	7	0	5
闕載	3	4	3	6

表六顯示：蒙古進士之母為漢族者佔總人數的 68.2%，妻子更高達 71.4%，色目人通婚比例較低，母親為漢族者為 54.5%，妻子為漢族者則為 50%，都在半數以上。

色目進士之家通婚比例較低，應可歸因於宗教。進入中原之蒙古人或保持原有的沙漫教，或改宗佛教，皆不構成聯姻漢人的宗教藩籬。而元統元年色目進士 25 人中，回教徒多達八人。由於宗教原因，回教徒所娶多為同教中人。例如元統元年科進士慕蒿、口合謨沙（1305-?）、阿都刺（1308-?）、刺馬丹（1302-?）等四人之母皆為阿魯渾（Arghun）氏。上述四人中，刺馬丹本人所娶為穆速魯蠻（Mussulman），其他三人則未娶。此外別羅沙（1308-?）之母為回回氏，娶答失蠻（Dashman）氏。回回、穆速魯蠻及答失蠻皆指回教徒而言，而阿魯渾則為中亞信奉回教的一個部族。⁷⁶若扣除此等回教徒間的互婚，則蒙古、色目進士家庭與漢人通婚的比例甚為接近。

表六雖足以顯示蒙古、色目進士之母、妻多為漢族。但現有資料可進一步證明部分進士與漢人的血緣關係更為深遠。《元統元年進士錄》中偶有記載祖母氏族或姓氏者，顯示進士祖母中亦有漢人。例如蒙古進士阿虎歹之祖母為孟氏，唐兀進士安篤刺之祖母為劉氏、樊氏，應該皆為漢人。又如進士廉方之家自其曾祖布魯海牙以還，便與漢人通婚。廉方之妻為趙密（1261-

1334) 之女，密為易州涑水人，出身將門，襲職鷹房都總管，卻是大儒劉因弟子，為一儒將。⁷⁷ 更如慕萼之祖父堪馬刺丁娶葉里干氏，繼娶蔣氏、周氏、龍氏。慕萼之父哈八石為龍氏子。但龍氏早卒而蔣氏「賢而讀書」，待哈八石如親子，可見慕萼之父已含漢血，⁷⁸ 且由富有教養之漢人扶持成材。顯然不少元統元年科進士的漢族血緣超出一半，而且其文化取向與其祖母、母親為漢族亦有關係。

元統元年以外 15 科進士家庭婚姻資料較為殘缺，不便統計，茲臚列於表七之中。表七與表六歧異之處是加列進士曾祖父與祖父二代與漢族通婚資料。15 科中現尚可考蒙古進士 40 人中，曾祖母、祖母、母親或妻子為漢族者有九人。色目進士 71 人，上述四代配偶為漢族者 17 人。雖不及元統元年進士家庭比例之高，但由於史料殘缺，上述兩個數字所反映的可能僅為實際情況的冰山一角。

表七顯示某些蒙古、色目進士與漢族家庭通婚頗具持續性。汪古馬氏、答祿乃蠻氏及康里太禧奴等家族，皆是累世與漢族通婚。馬祖常、祖孝之高祖母為金太尉王明德之女。⁷⁹ 曾祖母白氏、祖母張氏可能皆為漢人。⁸⁰ 母楊氏，為中書左右司郎中楊琰女，當為漢人。⁸¹ 而祖常之妻索氏，可能亦為漢人。⁸² 馬氏家族至祖常可能與漢族已五世通婚。答祿守禮、守恭之曾祖父（即與權之高祖父）抄思娶張氏、康里氏。祖父別的因為康里氏所生，但由張氏所養，張氏為代州石門良家子。別的因之妻梁氏，出身「大名貴族」，當出漢族士人門第，即守禮、守恭之祖母。其一孫女，亦即守禮、守恭之姊妹，嫁與同年進士，出身汴梁的趙期頤，可見答祿氏與漢族三世通婚。⁸³ 太禧奴家族與漢族通婚的歷史也是源遠流長。高祖燕真所娶為忽必烈所賜配高麗美人金長姬，屬廣義漢人。曾祖不忽木娶寇氏、王氏。寇氏出身中山安喜

79 元好問，《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卷 27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頁 638-641。

80 《元史》，卷 134 月合乃傳，頁 3244-3245。

81 《石田先生文集》，卷 13 梁郡夫人楊氏墓志銘，頁 245-246。

82 《滋溪文稿》，卷 9 馬文貞公墓志銘，頁 138-145。

83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8 答祿乃蠻氏先塋碑，頁 12 上-17 下。

84 趙孟頫，《趙孟頫集》（任道斌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 7 文貞康里公神道碑，頁 158-161。

85 《宋文憲公全集》，卷 41 康里公神道碑，頁 18 上。

表七 十五科蒙古色目進士家庭與漢族通婚

	科次	姓名	曾祖母	祖母	母	妻
蒙	延祐五年	忽都達而		馮立孫女		河東聶氏
	至治元年	泰不華				石抹繼祖女
	泰定四年	答祿守禮	代州張氏	大名梁氏		
		哈刺台		張泰魯女		
	至順元年	篤列圖 (字敬夫)			王氏、畏兀 氏、潘氏	
		答祿守恭	代州張氏	大名梁氏		
古	至正二年	答祿與權	大名梁氏			
		揭毅夫		潘氏		
	至正五年	篤列圖 (字彥誠)			哈魯氏、高 氏、朱氏	
色	延祐二年	馬祖常	白氏	張氏	楊琰女	索氏、怯烈氏
	延祐二年	馬祖孝	白氏	張氏	楊琰女	
		僕哲篤	奧屯氏			
		哈八石			葉里干氏、 蔣氏、周氏 、龍氏	
	延祐五年	僕玉立	奧屯氏			
	至治元年	廉惠山海牙		石抹氏		
	至治元年	僕朝吾	奧屯氏			
	泰定元年	僕直堅	奧屯氏			
	泰定元年	師孛羅	惠氏	王氏		
	泰定四年	善著	奧屯氏			
	至順元年	僕列篋	奧屯氏			
	前期不詳	納失理	畏兀氏、孟氏			
	至正二年	馬世德	王明德女			
	至正十四年	太禧奴	寇氏	史氏、王氏 、崔氏	回回一子娶 任仁發女	
	後期不詳	愛理沙			馮氏、王氏	
	後期不詳	長吉彥忠			慈溪黃氏	
	總期不詳	馬祖善	白氏	張氏		

儒士寇氏家族。太禧奴之祖父回回即為寇氏所生。⁸⁴回回，娶史氏、王氏、崔氏皆可能為漢人，⁸⁵回回有五子，其中一子娶著名畫家、都水庸田使松江任仁發（1254-1327）之女。⁸⁶現不知太禧奴為何人之子，若為此婚姻之結晶，則其家族與漢人聯姻業已長達四代。總之，馬氏、答祿氏及太禧奴家族與漢族累世聯姻，可能是導致此三家族子弟連翩登第的一個原因。

15 科蒙古、色目進士聯姻的漢族婦女，不少出身於士人家庭，答祿守禮之曾祖母代州張氏，太禧奴之曾祖母寇氏皆是如此。此外，延祐 5 年進士忽都達而為宋某路提點刑獄馮立之孫女。⁸⁷泰定 4 年進士哈刺台之曾祖母張氏為黃岡儒者張泰魯之女。張氏女對其子孫影響頗大。蘇天爵撰 元故贈長葛縣君張氏墓志銘 說：

初，皇慶科舉詔下，哈刺台甫十餘歲，縣君（張氏）呼而教之曰：「我昔居父母家，歲時親戚小兒來者，吾親必祝之曰：『長大作狀元！』自我為汝家婦，恒在軍族，久不聞是言矣！幸今朝廷開設科舉，汝能讀書登高科，吾復何恨？」於是悉資給之，俾從師受業。泰定三年（1326）策試進士，哈刺台果中第二甲第一人。⁸⁸

可見入嬪異族的漢族婦女常將唐宋以來中原盛行的「狀元情結」灌輸於其子弟。張氏孫男七人中，除哈刺台外，又有三人亦「治進士業」，應該都是受此漢人婆婆的影響。總之，出身漢人士族的婦女往往知書達禮，往往鼓勵子孫讀書應舉，以求光大門楣。

元代中後期蒙古、色目族群中業已形成一個數目龐大，日益增長的士人群體。⁸⁹與漢族士人通婚，對子孫讀書登第固然有助，與其他蒙古、色目漢化士人家庭聯姻，對家庭科舉傳統之開啟或延續亦有裨益。延祐 2 年進士僕哲篤，至順元年狀元篤列圖皆可為例。僕哲篤妻月倫石護篤（1301-1341），與哲篤同屬畏兀族。月倫石之父八里麻吉而的為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其母出於著名漢化世家高昌廉氏，為中書左丞廉希恕（布魯迷失海牙）之女，亦

86 阮元等編，《石渠寶笈續編》（臺北：故宮博物院，1971），巖巖跋任仁發所繪，張果見明皇圖，頁 244。

87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7 捏古公神道碑，頁 13 下。

88 《滋溪文稿》，卷 21 元故贈長葛縣君張氏墓志銘，頁 359-361。

89 蕭啟慶，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收入蕭氏，《元朝史新論》，頁 203-242。

90 《金華文集》，卷 39 魏郡夫人偉吾氏墓志銘，頁 17 下。

91 蕭啟慶，蒙元時代高昌僕氏的仕宦與漢化，頁 267-270，291-294。

92 關於僕氏之遷至高麗，參看黃時鑒，元高昌僕氏入東遺事，清華大學歷史所主辦「海峽兩岸

即廉希憲之姪女。月倫石護篤知書達禮，尤諳女學，黃潛撰 魏郡夫人偉吾氏墓志銘 說：

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⁹⁰

哲篤與月倫石護篤產有七子，一人為進士，一人為鄉貢進士，三人為國子生出身，可說學業多有成就。⁹¹ 其中僕百遠遜於元末攜家避入高麗，後亦成為高麗與朝鮮二朝的科第仕宦世家。⁹² 篤列圖之妻為其座師馬祖常之妹，是一段因科舉而締結的良緣。⁹³ 元季詩人王逢「瓊林宴狀元，銀屏會佳婿」之句即係歌詠其事。⁹⁴ 祖常之妹亦應知書達禮，其子揭毅夫後登至正 2 年第。

總之，蒙古、色目進士出身之家庭多與漢族家庭 尤其是士族 通婚。嫁入蒙古、色目家庭之漢族婦女往往教導或鼓勵子孫讀書應舉，有助於這些家庭在科舉中之成功。此外，與其他蒙古、色目士人聯姻亦有助於家庭科舉傳統之開始與延續。

六、結 論

元朝的科舉制度是當時特殊政治社會結構的反映。蒙古、色目人在科舉中與漢族享有相等的配額，則可說是元朝科舉制度的一大特色。

蒙古、色目人為元代社會中的外來族群，不僅在當時社會中與漢族居於不同地位，其固有文化與漢族亦大有差異。因而對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探討，所應注意的不僅是社會流動的問題，亦是蒙古、色目族群的漢化問題。

本文自家族仕宦經歷、族群分布與婚姻關係等三方面探討了蒙古、色目進士的背景及其與登科的關係。

自家族仕宦經歷言之，多達八成（81.2%）的蒙古、色目進士出身於

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1999年5月。

93 虞集，《道園類稿》，卷46 靖州路總管捏古公碑，頁23下-31上。

94 王逢，《梧溪集》，卷3 故內御史捏古氏篤公輓詞，頁98。

官宦家族，而來自布衣之家者不過二成（18.8%），而且進士三代直系祖先曾任中上官職者將近五成（46.2%），而未曾仕宦的祖先僅佔三成（30.9%），可見科舉制度的主要作用在於為官宦子弟增加一條入仕的途徑。這種現象一方面顯示：元朝選官用人雖然最重門第，但高門子弟並非人人皆可憑藉蔭襲特權入仕。另一方面也反映蒙古、色目官宦子弟之學習漢文化較平民子弟享有較大利便。定居中原較早、漢化較深的文官家族子弟獲利最大。少數蒙古、色目科第世家皆是由此類家族蛻變而來。但是，布衣家庭出身的進士大多來自普通軍戶之家，可見科舉制度不僅為原來甚為閉鎖的蒙古、色目統治菁英階層注入數量不大，卻甚重要的新血，而且激勵下層家庭的子弟研讀詩書以求入仕，對蒙古、色目族群漢化的擴散具有促進作用。

自族群分布言之，蒙古各族原有文化水平頗為近似，科舉所產進士的數目亦甚平均。而色目各族所產生進士人數的多寡與其本族原有文化水平的高低、移居中原人口的多少及該族在元朝之地位具有關聯。色目各族中，畏兀、回回、唐古三族所產進士最多，哈刺魯、汪古次之，欽察、康里、也里可溫產生進士甚少，而吐蕃、阿速則交了白卷。各族產生進士的多寡顯然反映該族漢化的深淺。

自婚姻關係言之，甚多蒙古、色目進士的家族早已與漢族建立密切的通婚關係，嫁入蒙古、色目家庭的婦女不少來自漢族士人之家。這些漢族婦女往往知書識禮，對其子孫的文化取向及登科應舉具有重要影響。

總之，蒙古、色目躍登進士的機率不僅與其家族有無仕宦背景有關，而且與原屬族群之文化背景及家族婚姻關係等因素密切相關。從社會觀點來說，大多數進士是蒙古、色目族群中傳統菁英家族的延伸。從文化觀點來說，蒙古、色目進士則是其族群中漢化最深的一群。

Backgrounds of the Mongol and Se-mu *Chin-shih* of the Yuan Dynasty: An Analysis

Hsiao Ch'i-ch'ing

Abstract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Yuan dynasty was a faithful reflection of the unique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at period. The fact that the Mongols and the Se-mu were guaranteed a quota of *chin-shih*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equal to that of the Chinese majority was a salient feature of the Yuan system.

The Mongols and the Se-mu were privileged conquering minority groups with cultural backgrounds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hinese. Using the *List of Chin-shih of A.D. 1333* and 15 other *chin-shih* records reconstructed by the autho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ckgrounds of Mongol and Se-mu *chin-shih* and their success in the examinations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erms of the bureaucratic background of their families, more than 80% of the *chin-shih* had official backgrounds, and less than 20% could be considered "new blood" in the sense that none of their forebears in the previous three generations had held an office under the Mongol-Yuan regime. These 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was to open a new door to officialdom for the scions of bureaucratic families. Nevertheless, the system still injected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amount of "new blood" into the originally closed Mongol and Se-mu elite stratum.

In terms of ethnic background, while the numbers of the *chin-shih* produced by various Mongolian tribes and clans show no major differences, those produced by various Se-mu groups differed greatly from each other. This

is because while the Mongols had become an ethnically and culturally homogeneous group by the 14th century, the Se-mu was constituted of peoples from sharply divergent ethn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degree of success achieved by various Se-mu groups in the Yuan examination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levels of culture these ethnic groups had achieved before entering China.

In terms of the marital backgrounds of the *chin-shih* familie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chin-shih* were from Mongol and Se-mu families that had intermarried with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mothers in elite families were often educated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ir scions in terms of cultural orientation.

In sum,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the *chin-shih* as a group can be considered an extension of the original Mongol and Se-mu elite stratum.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hin-shih* were the products of the most heavily sinicized Mongol and Se-mu families.

Key Words: Yuan dynast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chin-shih*進士, Mongols, Semu